

企業政治關聯性與自結營收審計調整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Audit Adjustments on Pre-audit Sales

林靜香¹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副教授
keng@mail.ksu.edu.tw

陳佳玟²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碩士班
sophia10109393@gmail.com

摘要

本文以台灣獨有且強制公告之月營收為研究觀點，將自結營收與會計師公告營收之差額稱為審計調整數，作為盈餘管理之衡量變數。審計調整數數值具可觀察性及衡量性，避免像一般盈餘管用預期非裁決性盈餘推估裁決性應計數之衡量誤差之問題。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源，主動與政府保持關良好關係，稱為政治關聯性，建立政治關聯對企業是有好處，例如：公司租稅減免，較容易取得銀行融資等等。本文主要探討公司政治關聯性對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的影響，使用政府持股率及公司高階主管曾任政府部門人員作為公司政治關聯性之衡量。實證結果發現，當企業具有政治關聯性時，與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是負向關係，意味公司具有政治關聯時較不容易出現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

關鍵詞: 審計調整，自結營業收入，月營收公告，政治關聯性

Key : Audit adjustment、Pre-audit sales、Monthly sales announcement、Political Connections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過去台灣上市櫃公司缺乏如美國沙賓法案這種強大的內控制度規定，因此爆發博達、皇統等弊案，而這些弊案的共通點是存在操弄盈餘的行為。企業有時會因為了績效或是初期 IPO 價格的提高，而對盈餘作調整，投資者要如何發現企業有沒有操弄盈餘，最好且具公信力的方法就是仰賴外部第三者監督，而最讓大家所熟悉的獨立外部第三者是會計師，會計師專業財務能力且對於數字方面較具敏感性，因此企業是否進行盈餘管理，會計師會盡他監督者之角色發掘問題。一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後會對公司提出調整建議，並要求公司改正，實務上調整事項可分為調整分錄及重分類分錄，調整分錄是帳上有短溢或錯誤的情況給予調整；重分類分錄係針對科目重分類所作之調整，然而這些資料不容易取得，且都記錄在工作底稿之中，屬於非公開資訊。但我國存在公告自結數的特殊規定，正好讓投資人透過公司自結制度之實施，來觀察公司自結營收的品質。

我國針對財務資訊公開方面，在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三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並申報上月營運情形。此外，台灣證券交易所允許上市櫃公司額外揭露未經會計師簽證之自結損益。希望透過強制發布自結營收及自願揭露損益這兩種管道，可以補強投資者資訊不對稱的情況。范宏書、陳慶隆、李淑華與謝永明(2008)認為公司所揭露自結數在某種程度可視為管理當局的報導企圖，而會計師查核之後所審定下來的數字則是雙方共同討論妥協下的產物，兩種數字間的差異稱之為審計調整數(AAA)，此數字的差額具可觀察性及衡量性，可做為衡量盈餘管理的替代變數。與政府關聯性高之企業比無政治關聯性之公司掌握到的資源較多，且營運條件優秀，大大降低了調整的誘因，較不會進行盈餘管理。審計調整數會提高市場對公司負面觀感，對公司未來長久發展不利，因此企業會尋求其他援助，例如與政府人員建立良好的關係。

企業與政府間關聯性會提升企業整體價值。Boubakri et al(2008)發現政治關聯性高之公司，其績效好於政治關聯性低之公司。Ang and Boyer(2007)研究有關選舉捐獻所形成的政治關聯性會使企業在一些政策方面會享有特別的優待，結果指出政治人物大選期間公司給予許多政治獻金，其當選後會提供與他相關聯之企業有獲利的機會。羅黨論與劉曉龍(2006)探討中國地區政治關聯與公司經營績效之影響，測試結果發現政治關聯性對公司績效是正向。而在企業在融資和租稅方面，政治關聯性企業會有特別的待遇，在中國地區，管理階層曾擔任政治人物可為企業提供一定的保障與幫助，因此企業建立政治關聯性確實可以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因為先前研究大多注重在政治關聯對企業價值方面的研究，鮮少有盈餘調整方面的文章。本文主要探討政治關聯對自結營收調整數的影響。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分為：壹、緒論，一、研究動機與背景，二、研究架構。貳、文獻探討，一、政治關聯相關文獻，二、自結盈餘及審計調整相關文獻探討，參、研究設計，一、假說探討，二、資料樣本選取，三、變數定義，四、研究模型，肆、實證結果，伍、結論。

貳、文獻探討

一、政治關聯的重要性及影響

一般而言企業為了利潤極大化會透過各種管道尋求政治關聯性，藉由提供政治人物資源來拓展政治人脈與增加對政府的影響力，以期許未來能有利於公司的各式案件通過或者得到其他的利益。企業與政府政商之間的關係可由直接或間接方式聯繫，例如政府官員可以提供一些利潤不錯的案子給予與他有關聯的公司，使公司獲利的機會增加。因此許多研究顯示政治關聯性能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如同先前學者研究，發現企業與政治人物有關連，政治人物會為了企業整體價值的提升而給予企業各種優惠方案與福祉，而企業以利益極大化為目標與政府聯繫會更加緊密。

從許多文獻發現有無政治關聯對公司具一定影響力，Fisman(2001)以印尼總統的健康狀況作探討，研究中發現有政治關聯性之公司，股價的漲跌會隨著總統的身體狀況波動，結果顯示當總統身體發出警訊時，與總統有政治關聯性之公司，股價下跌的幅度比無政治關聯性公司大。Faccio and Parsley (2009)的研究中發現公司總部如果建立在政治人物的故鄉，會隨著政治人物的無預警身故而使企業股價下跌。Claessens, Feije and leaven(2008)對巴西公司1998到2002年選舉獻金研究，研究顯示公司在候選人選舉期間給予現金的幫助，然後候選人在當選後，公司與金融機構融資方面擁有優先權。

除此之外公司的價值也會受到來自法律的干擾，Hellman, Jones and Kaufmann (2003)的研究中發現法律制度會影響企業的績效發展，不同的法律效果會對企業的績效造成不同的結果，且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其市場機制通常不太健全，因此投資報酬相對較低。Li, Meng and Zhang (2006)研究發現政府關聯性與民營企業績效為正相關，研究指出在法律機制不健全、市場機制不完全的國家中，此效果影響更為明顯。政治關聯性的維持可幫助公司在取得銀行融資有很大的幫助，而政府的政策實施也會影響著企業決策，帶動企業整體的營運導向。羅黨論與劉曉龍(2006)以政府管控能力強的中國地區為研究目標，探討2004年到2006年的中國民營公司，發現很多產業進入壁壘狀態，這時公司若與政府保持良好的關聯性將可進入由政府管控之產業行列中，進而提升公司價值。換言之，公司如果與政府關係緊密，對於企業要進入這些高壁壘行業更容易，而進入高壁壘行業的公司其經營績效明顯好於其他的同業。因此政府的每一項的法律、政策都可能影響到企業整體營運環境。

除了法律影響，政治關聯對公司價值的影響途徑還包括公司背景及股權結構等因素。Eckel Vermaelen(1986)以政府持股對於投資標的公司之既有私人股東是否有影響作為研究觀點，以政府宣告購買公司股權時之市場反應作為應變數，研究發現當政府購買公司股權，市場有正向的反應，因為政府以公司股東身分參與公司內部管理監督較外部監管機構之成本來的低，加上政府會給予有關企業優惠方案及補助，而公司私有股東也能從中獲得好處。

黃玫心(2014)探討政府投資公司股權與營運狀況的相關性，研究中測試了政府投資公司是否可提升公司治理機，發現政府股權投資之公司，能使公司治理水準提升，這篇研究發現透過公股的控制，公股公司可行使股東權力，並提升公司之治理能力，且政府能透過股權取得公司股權之董監席次，公股股東為了企業利益著想，監督公司建立良好的內部機制，公司績效也因此往正向的發展。Sun, Tong and Tong(2000)以1994年至1997年上海及深圳的上市公司為樣，探討政府持股對公營企業是否有影響，發現政府持股的公司，其企業績效有正向的反應，顯示政府持股

對公司帶來的影響有正面效果，表示企業績效極佳，將會降低企業盈餘管理的動機。

Boubakri et al (2008)研究與政府相關連的公司，有高企業績效與高風險承擔能力。黃玉麗、沈中華、林昆立 (2012)探討政治關聯與債務資金成本的效果，發現當公司高層與政治人物關聯緊密，不論黨派，只要傾向於國民黨或民進黨其取得外來資金的成本較低。Soto(1990)研究顯示與政府關係密切較不容易被侵占資產且較能獲得政府補助和租稅減免。Khwaja and Mian(2005)發現公司與政府關係良好，可以以較低的利率獲得銀行融資。因此企業與政府關聯不僅可以讓企業整體價值提升，另外附帶一些外在優惠。社會經濟方面劉阿榮(1996)發現政府與企業建立良好關係可改善整體投資環境，促使資本留存在台灣，增加就業機會。因此合宜的互動，企業不僅可提升整體價值，亦有穩定社會功用，促進經濟發展。

二、自結盈餘及審計調整相關文獻探討

過去財務預測方面大多主要聚焦在盈餘預測準確度及盈餘預測與公告盈餘兩方面為主(張淑娟,1991;吳安妮, 1991)。民國 91 年正式實施自結損益制度前，以自結盈餘和公告盈餘研究為主，自結盈餘以盈餘概估為替代，盈餘概估主要屬未經會計師查核之自願性揭露，且在會計年度終了日後，財務報導公告之前，由管理當局主動發布之消息。楊孟萍、林瑞菁、盧宜倫(2003)探討盈餘概估與公告盈餘間之差異性，是否存在公司特性的影響，樣本選自民國 81 年至 89 年之公司盈餘概估資料，探討其盈餘概估與公告盈餘間是否受公司規模、審計品質、負債比率、股權結構、好消息影響，研究方面以 Logistic 模型衡量，實證結果顯示兩數值間之差異數與公司負債比例呈正相關，和董監事持股比率呈負相關。

民國 91 年後正式實施自結損益後，林嬋娟、王勇勝、馬鳳禧、陳慧玲(2003)之研究以實施後連續兩年作為觀察期間，探討自結盈餘的資訊品質，結果指出影響強制揭露自結盈餘準確度的因素包括好壞消息、股權結構及一些公司產業特性。好壞消息方面，擁有好消息公司傾向在強制宣告前提早揭露公司消息，故準確率較高，而壞消息公司則是相反，宣告時有所隱瞞，導致自結數與公告數誤差較大。股權方面，公司內部人員如持股越高，則為了維持聲譽及降低訴訟成本，公告之自結盈餘較為可靠。

此外有些學者將自結盈餘和公告盈餘間的差異數，另行定義一種新名稱，成為一項新指標。Hsieh and Tsai(2005)將我國獨有自結盈餘規定納入考量。該研究將自結盈餘與公告盈餘之差異數稱之為審計調整數(Aggregate Audit Adjustment, 簡稱 AAA)，其衡量會計師在未經查經查核的報導中偵測出不實表達的能力，檢驗外部審計過程是否可緩解企業盈餘管理程度，實證結果發現總審計調整數與盈餘管理呈現負相關，兩數字間存有性有替代性，表示會計師會運用其專業能力，減少企業自結盈餘的錯誤，藉以抑制公司從事投機性盈餘管理行為。

中國政府 2006 年規定企業如果為公開發行公司，每年必須向財政單位提交企業未經查核之盈餘，藉由未經查核盈餘與經會計師查核之公告盈餘發現是否存有審計調整數，而審計調整數之發生是會計師盡其專業能力的產物，具可觀察性(Lennox et al, 2014)。

我國范宏書(2008)等人研究認為，自結損益制度下，可視為管理當局對盈餘報導之企圖，而經會計師審定之盈餘，則可視為會計師同意之盈餘報導決策，雙方互動下之差額，具可衡量性及可觀察性。當自結盈餘高於會計師最後審定盈餘，表示公司自結盈餘之品質狀況不佳，而會計師會監督管理階層，避免其操弄自結盈餘，扮演好其監督者的角色。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說

先前文獻發現政治關聯對公司影響具正向效果，企業與政府間關聯性會提升企業整體價值，本文以政治關聯為切入點，探討政治關聯性高之公司掌握資源多而產生良好的營運條件，減少審計調整數出現的機率。Boubakri et al(2008)研究發現政治關聯性高之公司，其績效好於政治關聯性低之公司，較不會為了迎合預期績效而提高公司績效。Ang and Boyer(2007)研究有關選舉之捐獻形成的政治關聯，會使企業在政府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優惠，文中指出政治人物大選期間，公司給予許多政治獻金，政治人物當選後會提供與他相關聯之企業有獲利的機會。Soto(2006)研究發現政治關聯性高之企業較容易獲得租稅減免，較不會為了降低租稅進行盈餘調整，因此盈餘調整誘因減少。換句話說，在融資貸款及租稅優惠，有政治關聯性企業會有特別的待遇，管理階層曾擔任政治人物可為企業提供一

定的保障與幫助。黃玉麗(2012)發現當公司的高層具政治關聯性，取得資金成本較低，且相對於無政治關聯性之公司而言，較不會進行盈餘調整。劉東華(2014)認為與政府關係緊密的企業較容易獲得政府補助、租稅調降、取得高額融資等等；相對於政治關聯性低的企業，政治關聯性高的公司，取得融資成本低且政府給予租稅優惠，較不易進行盈餘管理。

過去台灣上市櫃公司缺乏如美國沙賓法案這種強大的內控制度規定，一般公司的財報多會接受會計師審計完成後的建議改善，所以會計師會依其能力與專業判斷財務報表中的錯誤，DeAngelo(1981)也述說會計師察覺和發掘報導公司誤述越多其審計品質越好，且會計師應展現其專業能力，對受查企業財報仔細檢查並依其專業能力從中發現錯誤，所以會計師的功能是提升企業財報的品質並減少受查企業財報的雜訊。Watkins et al(2004)也認為會計師的功能在於如何使用專業知識讓財報更簡潔乾淨，便於投資者閱讀。會計師會依照他的專業判斷並給予公司建議，公司會再依會計師建議作出適當判斷。經會計師調整建議分為兩種，一種調整分錄，另外一種是重分類分錄，然而這些資料並非那麼容易取得，且都記錄在底稿之中，屬於非公開資訊，但我國存在自結數公告的特殊規定，便於用來觀察公司自結財務品質，降低尋找資料的難度。

范宏書(2007)認為公司所揭露自結數在某種程度可視為管理當局的報導企圖，而會計師查核之後所審定下來的數字則是雙方共同討論妥協下的產物，兩種數字間的差異稱之為審計調整數(AAA)，此數字的差額具可觀察性及衡量性，可做為衡量盈餘管理的替代變數。Hsieh and Tsai(2005)研究總審計調整數為自結盈餘和公告盈餘的差額，衡量會計師在未經查核的報表中，偵測不實表達之能力。Lennox et al.(2014)研究中國特有制度，此篇研究也把自結盈餘與經會計師查核數之差額，稱之為審計調整數。認為(1)審計調整數的發生是因為財報有不實表達的部分，(2)衡量會計師在未經查核的報表中找出誤述並建議公司從中改正。審計調整數的產生是因為公司接受會計師所做出的建議，並進一步去改善財務報表所產生出來的差額，這時也間接證明了審計調整數之發生，表示公司自結營收品質不佳。

投資者要如何發現企業有沒有為了績效或是初期 IPO 價格的提高，而對盈餘作調整，最好且具公信力的方法是仰賴外部第三者監督，而最讓大家所熟悉的外部第三者是會計師，會計師財務能力優秀且對於數字方面較具敏感性，因此企業是否在自結盈餘作調整，會計師會盡他監督者之角色發掘出來，如實的把資訊傳達給投資者。與政府關聯性高之企業比無政治關聯性之公司掌握到的資源較多，且營運條件優秀，大大降低了調整的誘因，較不會出現審計調整數。

過去文獻大都肯定政治關聯的企業對財報帶來正面的效果，本研究也認為政治關聯對企業的財報品質具有正面效益，所以自結營收與查核數間的差額會減少。審計調整數方面參考了范宏書(2008)及曾慈恩(2014)前者是強制公告自結損益為前提之下研究，後者是以台灣證交法規定強制公告月營收為切入點，本研究選擇以自結月營收做為觀察現象一來是因為月營收公告是台灣獨有的規定，二來是因為搜尋資料較方便且全面。綜合以上想法建立假說

H: 政治關聯性與公司自結營收之審計調整數存在負向關聯性

二、資料及樣本選取

(一)、研究期間及樣本

本研究主要以 2013 至 2015 期間所有在台上市櫃公司為原始樣本。自結營收是每月發布，但會計師簽證是以季為基準，本研究參考曾慈恩(2016)之研究分別選取第一季及第四季為樣本群，分別為第一季樣本群是 4146 家，第四季樣本群是 4207 家。

(二)、資料來源

1. 自結營收資料蒐集，來自公開資訊觀測站
2. 政治人物資料本研究採取手動蒐集線上人物資料，利用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庫網站，立法院全球資訊網，政經資料庫，縣市議會及縣市政府全球資訊網蒐集而得。
3. 其餘資料獲取來自台灣經濟新報社(TEJ)

三、變數定義

第一季

(一)、應變數—自結累計營業收入審計調整數(ADJSALES)

本研究以當期自結累計營業收入出現審計調整數為1 否則為0

(二)、測試變數—政治關聯變數

GOV_{it} = 以政府持股率，本研究採用政府持股除以公司流通在外股數衡量。

PC_{it} = 為虛擬公司，當年度公司的高階管理人員(包括大股東)，曾經或當年度擔任政府部門人員則為1，否則為0

(三)、控制變數

衡量基礎方面，三項控制變數第一季樣本群均以前一年底之合併財報數替代，第四季樣本群則以當年之合併財報數為計算基礎。

- (1) 公司規模(SIZE) — 以前一年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公司規模大較易受到外界關注，所面臨外在成本較高，容易操弄盈餘，預期方向為正。
- (2) 負債比率(LEV) — 負債除以資產，高負債比率之公司，為了避免違反債務合約所產生之高額違約金，因此公司會利用盈餘管理之手段來規避，因此公司負債比率越高，管理階層越有動機進行盈餘管理，預期方向為正。
- (3) 獲利能力(RPA) — 資產報酬率，前一年稅後息前淨利除以總資產，公司為了保持一定獲利能力較有意圖美化報表，該意圖會使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情況增加，預期為正。
- (4) 董事會規模(BRDSIZE) — 董事會規模越大公司治理機制越強較能抑制盈餘管理，預期為負。
- (5) 獨立董監比率(BRDIND) — 獨立董事及監事比率越大公司治理機制越強，預期為負。
- (6) 審計委員會(AUDCMT) — 如果公司前一年設有審計委員會為1 否則為0 預期為負。
- (7) 會計師事務所規模(BIG4) — 前一年底公司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為1 否則為0 預期為負。

第四季

(一)、應變數

應變數—自結累計營業收入審計調整數(ADJSALES)

本研究以當期累計自結營業收入出現審計調整數為1，否則為0

(二)、測試變數—政治關聯變數

GOV = 以政府持股率，本研究採用政府持股除以公司流通在外股數衡量。

PC = 為虛擬公司，當年度公司的高階管理人員(包括大股東)，曾經或當年度擔任政府部門人員則為1，否則為0。

(三)、控制變數

- (1) 公司規模(SIZE) — 當年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公司規模大較易受到外界關注，所面臨外在成本較高，容易操弄盈餘，預期方向為正。
- (2) 負債比率(LEV) — 負債除以總資產，高負債比率之公司，為了避免違反債務合約所產生之高額違約金，因此公司會利用盈餘管理之手段來規避，因此公司負債比率越高，管理階層越有動機進行盈餘管理，預期方向為正。
- (3) 獲利能力(RPA) — 資產報酬率，當年稅後息前淨利除以總資產，公司為了保持一定獲利能力較有意圖美化報表，該意圖會使審計調整數增加，預期為正。
- (4) 董事會規模(BRDSIZE) — 以公司董事加監察人作為控制變數，規模越大之公司，治理機制越強較能抑制盈餘管理，預期為負。
- (5) 獨立董監比率(BRDIND) — 獨立董事比率越大公司治理機制越強，預期為負。
- (6) 審計委員會(AUDCMT) — 如果公司當年設有審計委員會為1，否則為0，預期為負。
- (7) 會計師事務所規模(BIG4) — 當年底公司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為1，否則為0，預期為負。

四、研究模型

由於本研究之應變數(ADJSALES)為虛擬變數，故參考曾慈恩(2016)及褚鴻勻(2014)以政府持股率(GOV)和劉東華(2014)的當年度公司的高階管理人員(包括大股東)，曾經或當年度擔任政府部門人員(PC)建立 Probit 模型如式(1)、(2)。

針對假說一(H1)，本研究預期政治關聯與自結營收審計調整存在負向關聯， a_1 係數為負。

$$ADJSALES = a_0 + a_1GOV + a_2SIZE_{it} + a_3LEV_{it} + a_4ROA + a_5BRDSIZE + c^2 + a_6BRDIND + a_7AUDCMT + a_8BIG4 \quad (1)$$

$$ADJSALES = a_0 + a_1PC + a_2SIZE + a_3LEV + a_4ROA + a_5BRDSIZE + a_6BRDIND + a_7AUDCMT + a_8BIG4 \quad (2)$$

ADJSALES=虛擬變數，當期自結累計營業收入出現審計調整數設為 1，否則為 0

GOV=用政府持有股率衡量%

PC =有公司高階管理人(包括大股東)曾任政府官員或現任政府官員=1 否則為 0

SIZE=ln(總資產)

RPA 獲利能力=稅後息前資產報酬率，Q1 為前一年稅後息前淨利除以總資產，Q4 當年稅後息前淨利除以總資產

BRDSIZE=董監總人數

BRDIND=獨立董監占董監總人數之比率

AUDCMT=虛擬變數，公司有設審計委員會者為 1，否則為 0

BIG4=虛擬變數，公司由四大查核者為 1，否則 0

肆、實證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

表 1 為敘述性統計，第一季(Q1)及第四季(Q4)樣本群，自結營收出現審計調整數虛擬變數(ADJSALES)之平均數均過半，顯示多樣本數之自結營收存有審計調整數；Q4 樣本群平均 0.70216 大於 Q1 平均數 0.60371，表示自結營收出現審計調整高於第一季。政府持股率(GOV)平均數 Q1 及 Q4 分別是 0.72806、0.72913，高階管理人曾有政治背景分別是 0.16618 及 0.17091，顯示樣本公司中高階管理人有政治背景普遍較少。控制變數方面 Q1 及 Q4，兩樣本群資產報酬率(ROA)最小值分別為-49.68%及-54.82%，最大值均為 49.95%，且最小值與最大值差異大，表該變數具有高變異程度。董事規模(BRDSIZE)、獨立董監比例(BRDIND)平均數顯示獨立董事會組成人數大多為 9 人，且全董事會成員中有 20%為獨立董監；設置審計委員會中位數為 0，顯示大多數公司未設置委員會，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虛擬變數(BIG4)平均數為 0.863 及 0.86451，顯示有大約 86%的樣本公司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簽證。

表 1 敘述性統計

表 1 敘述性統計											
PanelA:Q1						PanelB:Q4					
	平均值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平均數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N=4146						N=4207					
應變數						應變數					
ADJSALES	0.60371	1.0000	1.0000	0.0000	0.489184	ADJSALES	0.70216	1.0000	1.0000	0.0000	0.45736
測試變數						測試變數					
GOV%	0.72806	0.0000	45.74	0.0000	3.628144	GOV%	0.72913	0.0000	45.74	0.0000	3.65762
PC	0.16618	0.0000	1.0000	0.0000	0.372291	PC	0.17091	0.0000	1.0000	0.0000	0.37647

表 1 敘述性統計(續)

Panel A: Q1						Panel B: Q4					
	平均值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平均數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控制變數						控制變數					
SIZE	15.3010	15.0773	21.6245	11.0948	1.4391	SIZE	15.3329	15.1206	21.6245	10.80698	1.4398
LEV	40.7711	40.775	99.310	0.61	17.8005	LEV	40.4042	40.460	96.39	0.6100	17.7062
ROA	3.7512	3.9400	45.950	-49.68	8.67185	ROA	3.84051	4.0300	45.95	-54.82	8.4943
BRDSIZE	9.35962	9.0000	32.000	2.0000	2.2296	BRDSIZE	9.31899	9.0000	32.000	4.0000	2.21684
BRDIND	0.15483	0.2000	0.6667	0.0000	0.13856	BRDIND	0.17571	0.2000	0.7500	0.0000	0.14041
AUDCMT	0.04245	0.0000	1.0000	0.0000	0.20164	AUDCMT	0.07701	0.0000	1.0000	0.0000	0.26665
BIG4	0.8630	1.0000	1.0000	0.0000	0.34389	BIG4	0.86451	1.0000	1.0000	0.0000	0.34229

二、相關係數分析

本研究以 Pearson 相關係數檢測變數間之關聯，表 2 是 Q1、表 3 是 Q4，首先從表 2 Q1 的 pearson 相關係數可以看出來，Q1 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ADJSALES)與高階管理人曾有政治背景(PC)無顯著關聯，但政府持股(GOV)顯著負相關，代表政府持股之公司不會有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發生，符合預期。其他控制變數 Q1 方面公司規模(SIZE)、負債比率(LEV)與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ADJSALES)呈顯著正相關，表示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會正向影響自結營收調整數。；公司治理變數方面，獨立董監之比率(BRDIND)、設置審計委員會虛擬變數(AUDCMT)與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ADJSALES)呈顯著負相關，表示公司獨立董監比率越高以及公司設置委員會的情況下，公司治理機制越強，自結營收出現審計調整數的情況越低。另外，事務所規模(BIG4)與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ADJSALES)呈顯著負相關，表示公司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其自結營收存在審計調整情況較少。

表三 Q4 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ADJSALES)與高階管理人曾任政府官員(PC)無顯著關聯，但政府持股(GOV)顯著負相關，代表政府持股票，公司較不會有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的發生，符合預期。控制變數公司規模(SIZE)、負債比率(LEV)與 ADJSALES 呈顯著正相關，公司獲利能力(ROA)顯著負相關，表是企業獲利能力高，審計調整數出現的機會愈少，獨立董監之比率(BRDIND)、設置審計委員會虛擬變數(AUDCMT)與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ADJSALES)呈顯著負相關也與 Q1 一樣。上述是兩兩變數間的關係，其檢定能力不足以支持本文所有分析研究，接下來利用回歸模型做更嚴謹之分析。

表 2 Q1 Pearson 相關係數

	ADJSALES	GOV	PC	SIZE	LEV	PRA	BRD SIZE	BRDIND	AUDCMT	BIG4
ADJSALES	1									
GOV	-0.07336***	1								
PC	-0.01054	0.448123***	1							
SIZE	0.075034***	0.173164***	0.433468***	1						
LEV	0.153656***	-0.03927**	0.035897**	0.331772***	1					
PRA	-0.01588***	0.044618***	0.179684***	0.141788***	-0.16981***	1				
BRD SIZE	-0.01618	0.201172***	0.209913***	0.256242***	-0.00029	0.036928**	1			
BRDIND	-0.05509***	-0.00663	-0.01112	-0.05936***	-0.07446***	0.046325***	-0.03287**	1		
AUDCMT	-0.05443***	0.035379**	0.040981**	0.042198***	-0.03343**	0.002503	-0.08173***	0.346461***	1	
BIG4	-0.04459***	0.020519	0.100614***	0.125682***	-0.0265*	0.070609***	0.06742***	0.145272***	0.056057***	1

註:1***, **, *分別表示 $p < 1\%$ 、 $p < 5\%$ 、 $p < 10\%$ 的統計顯著水準。

表 3 Q4 Pearson 相關係數

	ADJSALES	GOV	PC	SIZE	LEV	PRA	BRDSIZE	BRDIND	AUDCMT	BIG4
ADJSALES	1									
GOV	-0.03712**	1								
PC	-0.02466	-0.03762***	1							
SIZE	0.085653***	0.178382***	0.429569***	1						
LEV	0.169368***	-0.02609*	0.040364***	0.328922***	1					
PRA	0.169368***	0.034456**	0.176951***	0.170687***	-0.16531***	1				
BRDSIZE	0.009309	0.200778***	0.196182***	0.252035***	0.005779	0.036492**	1			
BRDIND	-0.08096***	-0.00185	0.00492	-0.03268**	-0.06551***	0.034698**	-0.08468***	1		
AUDCMT	-0.07116***	0.050358***	0.055958***	0.069354***	-0.02281	-0.001	-0.10834***	0.418891***	1	
BIG4	-0.03762**	0.019799	0.093021***	0.12904***	-0.03123**	0.088986***	0.052272***	0.148484***	0.07528***	1

註:1***, **, *分別表示 $p < 1\%$ 、 $p < 5\%$ 、 $p < 10\%$ 的統計顯著水準

三、實證結果分析

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作為應變數，並以持股率(GOV)、高階主管曾任政府官員(PC)作為測試變數之方式進行回歸分析，以驗證是否符合本研究之假說。

表 4 以模型(1)探討假說政治關聯是否對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存在負向關聯，亦即政府持有股票對公司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之影響，應變數為(ADJSALES)，若自結營收有調整為 1 否則為 0。實證分析結果。表中發現 Q1 及 Q4 之政府持股率與顯著負相關，符合研究假說政治關聯對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存在顯著負向關聯。控制變數方面 Q1 和 Q4 的公司規模(SIZE)及負債比率(LEV)呈顯著正相關符合預期，表示公司規模越大和負債越高高之公司越有可能擁有美化財報的動機，致使自結營收出現審計調整數。公司內控方面 Q1 和 Q4 有設置審計委員會(AUDCMT)呈顯著負相關，Q4 有 BRDINDT 呈顯著負相關，表示公司治理機制更加全面，能替公司財報把關，而使自結營收品質良好，降低審計調整情形。Q1、Q4 之事務所規模(BIG4)呈顯著負相關，表示公司為四大事務所簽證者，其自結營收存在審計調整情況較少，支持原先之預期。

表 4 回歸模型實證結果

$$ADJSALES = a_0 + a_1GOV + a_2SIZE + a_3LEV + a_4ROA + a_5BRDSIZE + a_6BRDIND + a_7AUDCMT + a_8BIG4$$

變數	預測方向	Q1 樣本群		預測方向	Q4 樣本群	
		係數	Z 值		係數	Z 值
常數	—	-0.57916**	-2.55391	—	-0.5163**	-2.16244
GOV	—	-0.02587***	-4.38651	—	-0.01355**	-2.42261
SIZE	+	0.049147***	3.055675	+	0.057611***	3.42579
LEV	+	0.009368**	7.584516	+	0.010544***	8.18282
ROA	+	0.000846	0.356281	+	-0.00515**	-2.06201
BRDSIZE	—	-0.01011	-1.07142	—	-0.00311	-0.31286
BRDIND	—	-0.21825	-1.40312	—	-0.42231***	-2.57562
AUDCMT	—	-0.25305**	-2.41184	—	-0.23451***	-2.8113
BIG4	—	-0.15212**	-2.53427	—	-0.10805*	-1.71418
N			4146			4207
McFadden R-squared			0.02599			0.032815

註:***, **, *分別表示 p<1%、p<5%、p<10%的統計顯著水準

表 5 以模型(2)探討假說高階主管曾任政府官員之政治關聯是否對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存在負向關係，亦即高階主管曾任政府官員(PC)對公司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ADJSALES)之影響，應變數為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ADJSALES)，若自結營收有調整數為 1 否則為 0。實證分析結果顯示。表 5 中發現 Q1 及 Q4 高階主管曾任政府官員(PC)與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ADJSALES)呈顯著負相關，符合研究假說，控制變數方面 Q1 和 Q4 的 SIZE 及 LEV 呈顯著正相關符合

預期，表示公司規模越大和負債高之公司越有可能擁有美化財報的動機，致使自結營收出現審計調整數，公司治理變數方面 Q1 和 Q4 設置委員會 (AUDCMT) 呈顯著負相關，Q4 獨立董監事比率 (BRDINDT) 呈顯著負相關，表示公司治理機制更加全面，能替公司財報把關，而使自結營收品質良好，降低審計調整情形。Q1、Q4 之會計師事務所規模 (BIG4) 呈顯著負相關，表示公司為四大事務所簽證者，其自結營收存在審計調整情況較少。發現兩個實證結果都符合研究假說。

表 5 回歸模型實證結果

$$ADJSALES = a_0 + a_1PC + a_2SIZE + a_3LEV + a_4ROA + a_5BRDSIZE + a_6BRDIND + a_7AUDCMT + a_8BIG4$$

變數	預測方向	Q1 樣本群		預測方向	Q4 樣本群	
		係數	Z 值		係數	Z 值
常數	—	-0.55451**	-2.28354	—	-0.73347***	-2.85544
PC	—	-0.10324*	-1.70705	—	-0.19157***	-3.11975
SIZE	+	0.049195***	2.864322	+	0.073436***	4.06494
LEV	+	0.009655***	7.821344	+	0.010495***	8.13984
ROA	+	0.001276	0.534508	+	-0.00438	-1.74826
BRDSIZE	—	-0.01509	-1.6133	—	-0.00398	-0.40357
BRDIND	—	-0.21402	-1.37762	—	-0.41947**	-2.55698
AUDCMT	—	-0.26835**	-2.22955	—	-0.23759***	-2.84982
BIG4	—	-0.14473**	-2.4141	—	-0.10193	-1.61565
N			4146			4207
McFadden R-squared			0.022869			0.033574

註:***, **, *分別表示 p<1%、p<5%、p<10%的統計顯著水準

伍、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上市櫃公司政治關聯性對自結營收出現審計調整數之影響，使用 probit 迴歸分析探討政治關聯性對公司自結營收之審計調整數是否存在負向關聯性，測試變數使用政府持股 (GOV) 及高階主管曾任政府官員 PC 衡量政治關聯性，本文參考曾慈恩 (2016) 自結營收相關文獻分為第一季 (核閱) 及第四季 (查核) 作測試。實證結果發現，政治府持股 (GOV) 對自結營收審計調整數存在顯著負相關，研究推論政府透過公股股東監督行為，促進公司內控制度提升，公告之自結營收較準確，使公司較不會為了其他因素調整自結營收；另一方面，政治關聯性越高，則可從政府方面獲得較多資源，能降低自結營收數調整機率，支持研究假說。高階主管曾任政府官員 PC 呈顯著負相關，表示公司高階主管曾擔任政府官員對政府政策實施有影響力，可從政府獲取足夠的資源和獲利機會，公司較不會調整營收金額，使得公司減少審計調整數出現，符合研究假說。

參考文獻

中文

1. 李建然(1997),〈影響臺灣上市公司自願性盈餘預測因素之研究〉,臺灣大學會計學系碩士論文。
2. 林嬋娟、王勇勝、馬鳳禧、陳慧玲(2003),〈自結損益之規範:資訊揭露行為、市場效應與自結盈餘資訊品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91-2416-H-002-025),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暨研究所
3. 范宏書、陳慶隆、李淑華、謝永明(2008),〈總審計調整數對公司財務報表公布時效性之影響〉,《輔仁管理評論》第15卷(1期):73-104頁
4. 張淑娟(1991),〈盈餘預測準確度與公司特質關係之研究〉,政治大學會計學系碩士論文。
5. 曾慈恩(2016),〈導入IFRS前後自結營收審計調整之比較〉,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6. 黃玫心(2014),政府股權對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之影響,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博士論文
7. 黃玉麗、沈中華與林昆立(2012),政治關聯(係)與債務資金成本,管理學報,29卷2期,155-185。
8. 楊孟萍、林瑞青、盧怡倫(2003),〈自結盈餘與公告盈餘間差異之影響因素研究〉,《臺大管理論叢》第14卷(2期):135-160頁。
9. 劉東華(2014),〈企業政治關聯性與盈餘管理〉,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劉阿榮(1996),戰後台灣政商關係演變之研究(上),近代中國,111期,62-81
11. 褚鴻勻(2015),〈政治關聯與公司價值之實證研究〉,台灣大學會計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蔡彥卿、楊孟萍(2008),〈月營收與股價關聯性—臺灣上市電子業公司個別探討〉,《會計研究月刊》第275期:38-49頁。
13. 蔡醒亞(1999),〈我國上市公司每月營業收入與股票交易量關聯性〉,政治大學會計學系碩士論文。
14. 羅黨論與劉曉龍,2009,政治關係、進入壁壘與企業績效—來自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第五期:97-106。
15. 蘇弘哲(1995),〈臺灣地區上市公司每月營收公告對股價之影響〉,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論文。

英文

1. Ang, J., and Boyer, C. (2007), Finance and politics: The wealth effects of special interest group influence during the nationalisation and privatisation of Conrai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1(2), 193-215.
2. Boubakri, N., Cosset, J. C., and Saffar, W. (2008),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4(5), 654-673.
3. Claessens, S., Feijen, E., and Leaven, L. (2008),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e: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8, 554-580
4. DeAngelo, L. E. (1981).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3): 183-199.
5. Faccio, M., and Parsley, D. C. (2009), Sudden deaths: Taking stock of geographic t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44(3), 683-718.
6. Fisman, R. (2001),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1095-1102.
7. Hellman, J. S., Jones, G., and Kaufmann, D. (2003),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4), 751-773.
8. Hsieh, Y. M., and Y. C. Tsai. (2005). Aggregate audit adjustments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Further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udit quality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2005 Annual Meeting (New Scholars Concurrent Sess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9. Khwaja, A. I., and Mian, A. (2005), 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 1371-1411.
10. Lennox, C. S., X. Wu, and T. Zhang. (2014.) Does mandatory rotation of audit partners improve audit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89(5): 1775-1803.
11. Li, H., Meng, L., and Zhang, J. (2006),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Inquiry, 44(3), 559-578
12. Soto, H. (1990),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Perennial Library.
13. Sun, Qian, Wilson HS Tong, and Jing Tong. (2002). How Does Government Ownership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Privatization Experi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9.1-2: 1-27.
14. Watkins, A. L., W. Hillison, and S. E. Morecroft. (2004). Audit quality: A synthesis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Literature 23: 153-193.